

我心目中的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

陈 锡慰 第 20 期笹川生

南京医科大学病原生物学系

一、 我所认识的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

我是在 1987 年上半年知道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的。那时，我已经通过教育部的日语留学人员的考试，作为访问学者，由江苏省人民政府先行公派来到日本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正在该校的医学动物学教研室学习，受教于吉田幸雄教授。从吉田教授那里得知，中日之间建立了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而且，很快将有国内笹川医学奖学金学者来到同一教研室学习。

其后，我对该制度有了逐渐加深的认识，意识到“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设立的宗旨是促进中日两国医学界人士的友好交流，进而为亚洲的和平与人类的健康事业做贡献。通过邀请中国从事医疗保健工作的学者到日本，在加深相互理解的同时，促进双方在医学及其他医学相关领域的友好合作，进而为中日两国医疗发展做出贡献。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设立的起点较高，它的成功实施必然直接造福于两国人民，特别是惠及中国人民的健康事业，因此，它将具有较长期的生命力。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的实施过程具有严格的筛选和考核标准。例如：奖学金申请者必须首先通过卫生部国家考试中心主办的“全国卫生系统外语水平考试(LPT)”，该项考试每年合格者约在 1000 名左右，再由全国各地向卫生部推荐其中的 300 人作为研修候选者，最后由卫生部根据考生的业绩、论文、课题以及各项具体要求等进行审查，向日方推荐 90 名候选者，日方则从中方推荐的候补者中另选出 10 名，共 100 名作为每年选派人。“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的第二阶段，改为“日中笹川医学研究者制度”，每年收研修员 80 名，特别研究员每年 20 名。初选合格者赴日前还要进行语言培训（包括日语和英语），按卫生部规定，日中医学协会每年派 4~6 名日语讲师授课。通过日语考试的考生，要分别到西安医科大学英语训中心和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日语培训中心进行语言培训。英语考生在卫生部白求恩医科大学日语培训中心（现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进行日语培训，由日本派遣的教师与中方教师共同负责。最后，日中医学协会的负责人将进行日语的面试和作文笔试，综合考察各位研修者的语言能力，研究能力、生活能力等。这种出国留学人员的筛选过程是中国国内迄今为止所有公派出国留学制度中标准最为严格、程序最为复杂的。这样既保证了进修生的质量，又保证了进修生赴日后的日常生活、研究学习等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因此，可以说“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设立者和实施者的良苦用心。

众所周知，“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的创始人笹川良一先生是世界最大的基金会组织之一，日本财团创始人。笹川良一先生奉行“世界是一家，人类皆兄弟”的

信条,利用该财团来自赛艇的收入,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规模庞大的慈善活动,在防治麻风病等方面成绩卓著,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在联合国本部设置了笹川良一胸像,1982年他获得联合国和平奖,1989年又被任命为世界卫生组织亲善大使。笹川阳平先生接替其父成为日本财团理事长后,秉承其父亲的“为人类奉献不已”的精神,领导日本财团在世界更广泛从事慈善事业,在消灭麻风病方面取得显著成绩,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任命其为世界铲除麻风联盟特殊大使。

本人认为,“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虽然形式上看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民间交流,实际上,两国政府对这一跨度达20年以上的人员交流都非常重视。在中国方面,从该制度成立之初,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生前曾这样谈及日本友人笹川良一先生,“记住笹川先生,他侠肝义胆,中日两国之间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的”。笹川良一先生还受到我国领导人李鹏、王震、杨尚昆等的会见。其后,由政府部门的卫生部直接领导和实施这一规划,将这一规划完全纳入政府行为,表明中国政府对此是高度重视的。另一方面,在日本,由于笹川良一先生在政界的影响和与执政党高层人士的人缘关系,日本政界对该制度也很重视,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前首相中,中曾根康弘、竹下登、宫泽喜一、羽田孜、桥本龙太郎、森喜朗等均参加过笹川医学奖学金研修生的欢庆活动。森喜朗前首相还专门出席了2007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20周年纪念活动,关心和支持该制度的日本国会议员也有不少。这些事实表明“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与其说是完全的民间交流,不如说是一种半官方半民间的交流更为合适。

二、 我所参予的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

我是20期的笹川医学奖学金研修生,1997年4月来到东京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寄生虫学部,受教于的小岛莊明教授。小岛教授是日本寄生虫学界知名权威,在日本血吸虫病的免疫学研究方面有所建树。与我在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时的吉田幸雄教授相比,年纪稍轻。吉田教授是第一期笹川医学奖学金的指导教师,在机会性寄生虫病的研究方面成果卓著,是日本寄生虫学界的老前辈。由于本人在参加20期的学习之前来过日本,因此已经比较熟悉日本的情况。我觉得有必要从自己的留日经历中,从感知的方方面面谈谈体会,以供大家参考。上述两位日本教授每日大约上午9时前到达教研室,中午一般自带盒饭,吃午饭时间大约30分钟左右。其间,一遍吃饭,一遍与同室的下属商谈工作。中午一般不午休,然后从下午一直工作至晚上9时左右。每日如此,甚至有时在周六的上午也来学校。从教授的敬业态度,对日本教师的工作及敬业状况就可见一斑。日本教授在学术上也很谦虚,实事求是。教授与同事之间关系融洽,记得有一次,同室的一位讲师家里失火,教授带头捐款,很令人感动。在学校、在教研室内,很少听到日本同事之间谈论政党、竞选、领袖等政治问题,偶尔听到也是开开玩笑而已。日本人之间很少听到谈论别人的事情,特别是在背后议论某人的长短等,我想这也许是

日本人比较团结，集体主义精神较强的原因吧。因为总是在别人的背后议论人，迟早会造成误会和矛盾，结果就造成了不团结。日本人的纪律性很强，相互之间也很守信用。例如：在仪器使用方面，一台 PCR 循环仪几乎 24 小时不停运转，各人均可使用，为什么能做到有条不紊呢？他们只靠 PCR 循环仪上面挂着的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预约者的姓名和使用的时段。表面上是一块小黑板，其实质是日本学者的良好纪律性和信誉。这样，使购置的仪器在最佳的期间内尽可能地发挥了最大的效益，既发挥了仪器的价值又节省经费。这点值得我们深思，不像有些人以购置新型仪器和拥有新仪器为荣耀，认为只要自己使用方便就行，不管国家的投入和产出的效益。要知道仪器的管理和使用会反映出学校甚至一个国家的管理水平，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团队甚至一个民族的协作精神。现代的科学早已脱离小作坊似的运作模式，没有大团队的共同协作，很难取得好的科研成果。日本的大学或研究所内仪器的共享率和使用效率极高，这非常值得中国的行政管理学习。日本人也并非想象中的“工作狂”，我所在单位的教授自己在神户拥有一艘游艇，每年夏天组织全室员工一起去旅游；另一单位的教授也组织全体同事去日本的阿尔卑斯山登山滑雪。这样使大家精神得到放松，又增强了凝聚力，就像日中医学协会组织每届笹川生游玩东京迪斯尼乐园一样，给大家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日本的教授是好客的，本人曾在日本的春节期间应邀去吉田教授家作客，据说在日本在自家招待客人是最高礼节。当然，由于两国民族的政治、文化、教育、生活习俗等方面背景不同，在世界观和个人行为习惯方面存在差异是正常的。

三、 我所希望的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

“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已经实施 20 多年，是应该对该制度作出综合评价的时机了。当然，对于“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的评价和改进应该是中日两国有关负责人之间的事情。但作为该医学奖学金一名学员，从个人的立场对该制度作些评论也不是不可的。我认为中日两国关系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不时地出现一些矛盾和争论这是不奇怪的，只要“存异求同”，两国关系肯定会得到正常发展。但是，如果想要取得深入稳固的发展，必须建立起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的基础。“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就是建立这一基础的一种最好方式，它立足于医学—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科学，通过培养和提高中国高等医学院校教师和临床医师的知识水平和技能，再造福于占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这点上来看，它的作用要大于麻风病防治等。因此，“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受到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欢迎，就是必然的事情了，以至于本人称之为是半官方半民间的交流活动。中日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中会有晴天和雨天出现，这需要维系的纽带，“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纽带。

本人认为，该制度仍然应该以培养更多的进修生为目标。从每年 100 名的原计划中缩减人数，设立特别研究者似乎不太合适。特别研究者可以通过中日之间建立合作研究课题，从课题经费中选拔合适的研究者，这样针对性更强。同时，适当增加基础医学的教师培养人数是必要的，通过培养教师再去培养学生，效果得到放大。

另外，研修生在日本的生活管理有待细化。例如：一般来讲，研修生使用上届同学的遗留物品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几届同学使用下来已经陈旧的物品，再给新来的同学使用这就不合适了。在租房使用上，交接时一定要仔细检查有无损坏，不要造成房东和同学之间的矛盾。总之，具体负责同学生活的职员为大家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但是，为了做的更好，有必要注意这些问题。

最后，借此机会再次向笹川阳平先生和其他有关人员表示感谢。